

日藏敦煌遗书的来源与真伪问题

高田时雄/著 马永平/译

[摘要]现在日本藏有为数不少的敦煌写卷,尤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从中国流入的敦煌遗书数量特别多。著名的李盛铎旧藏卷子的真品已经在1935年归于羽田亨之手而目前藏在大阪杏羽书屋。但其他收藏单位称为李盛铎旧藏的敦煌遗书也不乏其例。这些写卷大部分经由商业渠道出售给收藏单位,来源不可置信。来自李家的根据之一便是“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但此印早受到怀疑,至少存在很多伪印,而且李盛铎本人也从未用于敦煌写卷真品上。本文以杏羽书屋晚期收藏的写卷以及藤井有邻馆收藏的称为何彦昇旧藏的写卷为例揭穿了伪造写卷的实例。

[关键词]日藏敦煌遗书;李盛铎;写本的真伪

中图分类号:G25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6)11—0001—09

基金项目: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A)“中国典籍日本古写本研究”(25244015)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高田时雄,日本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名誉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敦煌学。马永平(1963—),男,河南郑州人,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四川 成都 610041

前言

日本现在到底藏有多少敦煌遗书,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尽管公立、私立的图书馆、博物馆都在不断公开有关信息,但个人手里掌握的资料依然不够明确。另外个人手里的资料经常转手,持有人变换不定,要想获得这方面的准确信息困难重重。尽管如此,20世纪20年代以后,大量敦煌遗书流入日本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其中夹杂了不少赝品。本文拟探讨日本所藏敦煌遗书的流入路径问题,同时分析写本的真伪。

一、日本国内敦煌遗书收藏者的变迁

昭和4年(1929)发行的《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一卷收录的“敦煌本古逸经论章疏并古写经目录”,将大英博物馆、法兰西国民图书馆、北平京师图书馆、大连博物馆、旅顺博物馆等国外收藏机构以及国内当时收藏的敦煌遗书列成了简单目录,其中包括大谷大学图书馆(34件)、龙谷大学图书馆(7件)、中村不折的禹城出土墨宝(164件)以及其他诸家的收藏。后来,这些被王重民在其《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作为“散录”再度收录^①。这里所说的诸家,主要是指浅野长武、伊藤庄兵卫、上野理一、江藤长安庄、小川为二郎、小川劝之助^②、成策堂文库、田中庆太郎、高楠顺次郎、富冈谦藏、内藤尧宝、内藤虎次郎、西胁济三郎、松本文三郎、

三井源右卫门、三浦兼助、村山龙平、守屋孝藏、山本悌二郎、森政一、山口谦四郎、清野谦次等各位,其中除三井源右卫门110件、山本悌二郎17件、清野谦次19件收藏数量较多外,其余各收藏数量都未超过两位数,很多人只有1件^③。当然,这个名录原本仅为收录古逸经论章疏及古写经之作,故不可能尽展敦煌遗书的全貌,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它了解当时收藏者及收藏数量的大概情况。

其后,加上战争年代,时光已经走过了八十多个春秋,日本国内敦煌遗书的收藏情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方便起见,如将吐鲁番写本也计算在内,当前收藏写本数量较多的有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760件、书道博物馆145件、三井文库112件,此外还有静嘉堂文库、藤井有邻馆、宁乐美术馆、国立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御茶之水图书馆、大东急纪念文库、永青文库、龙门文库、京都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天理大学、九州大学、高知大学、东京大学、庆应大学、京都大学、国学院大学、唐招提寺、四天王寺、药师寺、东京莲念寺、名古屋西严寺、静冈县矶部武男氏、东京井上书店等都有收藏。收藏主体包括公立、私立图书馆和博物馆、大学、寺院、个人等,呈现出多样性特点。

八十多年间,既有写本离开老主人而找到了新主人的情况,也有自1929年“敦煌本古逸经论

章疏并古写经目录”刊行以后新购入的情况,其中可以推测30年代以后流入的数量与之前相比有了很大增长。这些日藏敦煌写本几乎都是经由书画古董商之手购买的,因此既有来源明确的写本,也有来路相当可疑的情况。日藏写本的真伪往往受到质疑,大概与这种流入路径不够透明有很大关系。

二、“劫馀”之后

在考察日藏敦煌遗书的来源问题时,如不考虑所谓的英藏、法藏、俄藏的敦煌遗书,那么传入日本的敦煌遗书来源应该全部都是中国。中国的敦煌遗书其实就是被称之为“劫馀”的部分,其主体是斯坦因1907年和伯希和1908年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带走大量文物之后的残余部分,1910年被移送至北京,构成了今天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的主干。然而一般认为,管理藏经洞的王圆箎违背北京之命,私自藏匿了部分经卷,以致第三次大谷探险队成员吉川小一郎在1911年、第三次探险的斯坦因在1914年春、俄国人奥登堡在1914年冬,都分别获得了经卷。如果王圆箎当初按照北京的命令将藏经洞的敦煌遗书全部运往了北京,那么这些人是无法得到经卷的。而事实上他们确实从王道士那里获得经卷,这只有—种可能,那就是王圆箎有私藏行为。另外,在从敦煌经兰州运往北京的途中,很多经卷都被盗取,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数李盛铎等人的盗窃事件。当年在经卷移送京师的过程中,担任甘肃省押运委员的人名叫傅宝华,江西人,经卷抵达北京后傅宝华并未送往学部,而是直接运到了甘肃布政使何彦升(1860—1910)之子何震彝(1880—1916)的府上。任命傅宝华担任委员的人是何彦升,因此将经卷直接送到何震彝家显然是他们提前商量好的。而何震彝的岳父名叫李盛铎(1859—1934),江西德化人,清末进士,爱好收藏。李盛铎伙同时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的同乡进士刘廷琛(1867—1932)以及朋友方尔谦(1871—1936),将运抵北京的经卷中的精华部分盗窃一空^④。因此,“劫馀”的敦煌遗书再次遭遇李盛铎等人的洗劫。

但是,这些经卷很快就离开了他们之手,开始辗转于世。日后据罗振玉讲,“李君者富藏书,故选择尤精,半以归其婿,秘不示人。方君则选唐经生书迹之佳者,时时截取数十行,鬻诸市,故予篋中所储,方所售外无有也。岁壬戌(1922),予自海东移寓津沽,则何君已物故,乃尽得其所藏数十卷,而以维摩诘经解二卷为之冠。”^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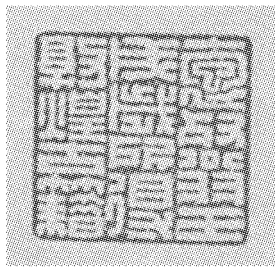


图1 “抱残翁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印

包括僧肇《维摩诘经解》在内,罗振玉将壬戌年所得写本在《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中进行了景印^⑥,这些写本出自何家应该没有任何疑问。如果把这一事实与京都藤井有邻馆的经卷系何氏旧藏联系起来考察,事情就会立刻变得非常有趣,十分引人入胜。

大家知道,1910年“劫馀”之后再遭盗窃的经卷中很大一部分后来都流传到了日本,但具体都有哪些?它们又是通过什么路径传到日本的?以及它们的真伪如何?下面,仅就自己掌握的资料展开具体分析。

三、杏雨书屋的“敦煌秘笈”

目前,在所有日藏敦煌写本中收藏件数最多的,当属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的杏雨书屋,共计760件。他们从事收藏的首倡者是羽田亨,提供资金支持的是第五代武田长兵卫,而1935年购入李盛铎旧藏写本就是他们收藏事业的真正开始,此后他们一直坚持大力推进收藏工作,取得了今天的突出成果。关于购买李盛铎旧藏之事,此前有过详细论述,此文不再赘述^⑦。这批藏品是李盛铎的第十个儿子李滂通过白坚卖给羽田亨的,路径清晰,来源可靠。现在,需要考察的应该是除此以外的其它部分。我们先来看看其余藏品都是怎么得到的。

“敦煌秘笈目录”^⑧的后半部分标有“新增部分”的名录,是羽田本人在每次新获写本之际记录下来,注有获取的时间和地点。现从其中摘录获取渠道如下:

433、434 右二卷,自佐佐木处 武田锐太郎氏购入

435、436 右二卷,同上(昭和11年11月6日)

437~446 右十卷,自北尾处购入(昭和11年10月)

447 右,武田锐太郎氏于奉天购入(昭和11年12月3日接收)

448~450 右三种,自佐佐木处购入(昭和12年1月29日)15、100、55^⑨

451~455 右五种,羽溪博士转让(昭和12

年7月15日)

456、457 右二种,自佐佐木处购入(昭和12年7月15日)35、35

458 道德经 获取来源不明

459 序听迷诗所经(自高楠顺次郎)

460 一神论(自富冈谦藏)

461~463 自佐佐木处购入(昭和12年12月)

250+50(佐佐木谢礼),150、50+5

464 自佐佐木处购入(昭和12年12月)30

465~467 谷口氏转让(昭和12年12月)

468~473 以上六卷,西胁济三郎氏转让(昭和13年1月)

474~480 以上七卷,中村敏雄氏转让(昭和13年12月29日)

481~484 安藤氏于东京转让(昭和15年1月15日)

485 自松村氏(昭和14年11月)

486~500 (缺)

501~550 富冈氏收藏

551~590 敦煌出土清野藏书目(40件)^④
(昭和14年10月27日)

591~629 自江藤涛雄处购入(昭和14年11月)

630~655 自江藤氏处购入(昭和15年 月)

656~670 以上15种,自江藤涛雄处购入

(昭和16年5月)

671~724 自江藤涛雄氏处购入(昭和17年4月)

725~736^⑤ 自江藤处购入(昭和17年12月)

羽田一次性购买李家的敦煌遗书432件之事,大约发生在昭和10年(1935)初秋时节,而实际到货则是翌年2月以后的事情了。“新增”的前2件为武田锐太郎(第五代武田长兵卫的长子,后来就任第六代武田长兵卫)从佐佐木竹苞楼处购买并交给羽田的,但未见日期记载。435、436也同为武田锐太郎所购,并有昭和11年(1936)11月6日的明确日期记载。由此推断,前2件的购买日期应比435、436的购买日期稍早一些。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推断,在与李盛铎旧藏写本到达的同一时期,采购规模进一步扩大,故而从李家获得写本这一事情,直接成为了羽田、武田双方携手的导火索。纵观此300余件的购买来源,其中虽有来自诸如羽溪了谛、高楠顺次郎、富冈谦藏等学者或诸如西胁济三郎、中村敏雄等收藏家的转让,但更多的则是购自佐佐木、北尾、江藤涛雄等商人之手。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昭和14年至17年间,所

有采购全部来自江藤涛雄(长安庄),多达146件这一数字的确非同寻常。

长安庄江藤涛雄是活跃于大正至昭和年间的古董商,他以西安为据点,从中国各地采购了大量的书画、古董、古写本等,运回日本。战前在东京上野的花园町不忍池畔开了一家名为“支那美术”的古玩店,经营贩卖青铜器、佛像、古印章、砖瓦、字画、陶器、碑帖、古钱币、古写本等几乎所有中国的美术古玩。现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学习院、国学院、龙谷大学、大谷大学、书道博物馆等国立大学、研究所等机构的很多收藏,都经过过长安庄之手。

在羽田经江藤长安庄购进的写本之中,常见钤有“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或“木斋审定”印章的古本。关于这些印章,藤枝晃教授曾经指出,京都国立博物馆所藏守屋孝藏氏旧藏古玩中20件写本上所见藏印均系伪造,钤有这些印章的写经其出处值得存疑^⑥。北京大学图书馆中藏有钤“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真印的李盛铎旧藏书,只要将两者做一对比,京都国立博物馆所藏守屋孝藏氏旧藏古玩中的20件写本的藏印的真伪应该可以立刻得以判明,问题是仅以钤印不真,就判定写经本身系伪造的做法是否合适?从藤枝晃刚刚提出这一看法开始,人们便有不同看法,存在广泛争论。

李盛铎印章很多,他会根据典籍的不同种类使用不同钤印,敦煌写本并无使用上列印章。这一点只要浏览一下敦煌秘笈前半部分的432件,即羽田从李滂手中购买的写本就会立刻明白^⑦。

让问题复杂化的是,羽田目录中附加的一页罗振玉的题跋。参照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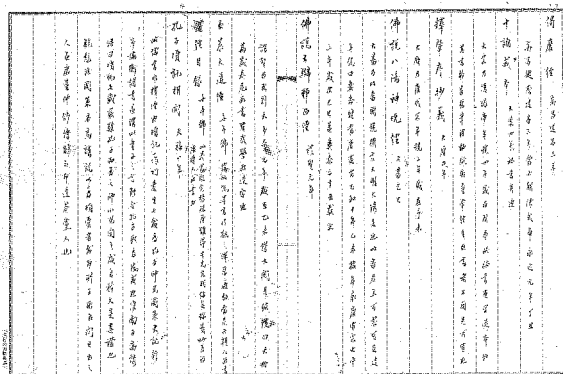


图2 罗振玉题跋

题跋以颇具特点的细字书写而成,毋庸置疑,这是出自罗振玉之手。现将题跋移录于下。为方便起见,前面添加《敦煌秘笈》编号,另外加注李氏藏书印的种类。

594 偈磨经 高昌建昌三年 “木斋审定”

高昌鞠茂建昌三年,当六朝陈武帝永定九年丁丑。

621 十诵戒本 大业四年秘书省造 “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

大业乃隋炀帝年号四年,在戊辰。此秘书省官造本,故其书体秀整,笔法动挺,与寻常经生所书者不同,是可宝也。

623 释肇序抄义 大历二年 “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

大历乃唐代宗年号,二年岁在丁未。

622 佛说八阳神咒经 大蕃己巳 “木斋审定”

大蕃乃吐蕃国号,犹言大明大清是也。吐蕃君主可黎可足建年号曰彝泰。时当唐宪宗元和十年乙未,按年表唐宣宗大中三年,岁次己巳,盖彝泰三十五载也。

597 佛说大辩邪正经 证圣元年 “木斋审定”

证圣乃武则天年号,元年岁在乙未,仅大阅月改号曰天册万岁。卷尾所书皆武曌所造字也。

613 玉晨大道经 无年号。据此纸墨书法观之,浑厚道劲,当是六朝人所书。

614 道经目录 无年号。 “摩嘉馆印”^④

此卷篇段完整,殊属难得,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此为初唐时人所书也。

617 孔子相託相问 天福八年 “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

此儒书非释经也。项託一作项橐,生十岁为孔子师,见《国策》、《史记》、《新序》、《论衡》诸书。盖谓此童子之言能令孔子取为法戒也。《淮南子》高诱注曰:“项託七岁穷难孔子而为之师,小儿闻之,咸自矜大”,是其证也。鲍彪注《国策》,本高诱说,以为项橐者或即《列子》所云“问日出之人”,孟康、董仲舒传则云即达巷党人也。

虽然与敦煌秘笈的编号和顺序并不完全一致,但全部都包括在昭和14年(1939)11月从江藤长安庄手中购买的39件之中。罗振玉是强烈批判李盛铎等人“窃取”行为的人物,最初他自己收藏的敦煌写本并不多,但当敦煌写本开始流入民间的时候,他却开始大肆收购。因此,可以认为,这8件写本是经江藤之手由罗振玉转给羽田的。那么,实际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罗振玉早在将伯希和送来的敦煌遗书作为《敦煌石室佚书》(1913)刊行出版的时候,就将其原先收藏的《太公家教》一并进行了影印。在此写本的卷首钤“曾藏罗叔言处”、卷末钤“雪堂”“罗振玉印”印。他还在宣统丁巳(1916)年刊行的《鸣沙石室佚书续编》中影印了《大云无想经》,其中印记与上相同,均为其初期收储。罗振玉在壬戌岁

所获藏品上钤“抱残翁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之印,可见其有在藏品经卷上钤印的习惯爱好。但是,这8件写本上未见罗振玉之印,反倒钤有李盛铎之印,此事不得不说不说颇为令人不可思议。本来这个题跋写在一张稿纸上就显得不同寻常,再加上稿纸上印有“木村公司特制品”字样,就更加显得十分突兀了。这个题跋恐怕是罗振玉按照长安庄之意专门为其书写的。如此一来,题跋的内容也就属于随口一说罢了,不应当真。

四、藤井有鄰馆的收藏品

下面,我们有必要把话题转到有鄰馆写本上来。这是因为,关于“敦煌秘笈”中江藤长安庄所供应的部分,与有鄰馆的藏品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京都的藤井有鄰馆藏有敦煌吐鲁番写本这件事,藤枝晃教授早在1947年10月27日举办的东洋史谈话会大会上就“长行马”进行演讲时已经提及^⑤。1954年,饶宗颐先生在藤枝教授陪同下访问该馆,制作了收藏写本简目,并作为“京都藤井氏有鄰馆藏敦煌残卷纪略”^⑥发表。另外,1956年藤枝教授对有鄰馆所藏写本进行了拍照,发表了《长行马》^⑦,此后渐为人们所知^⑧。

一般认为,有鄰馆所藏写本的大部均系何彦升旧藏,根据就是名曰《何彦升秋鞞中丞藏敦煌石室唐人秘笈六十六种》(下称有鄰馆目录)^⑨目录的存在^⑩,以及部分写本钤有“何彦升家藏唐人秘笈”之印。

但是,有鄰馆写本上不仅只有何彦升印,还可见“合肥孔氏珍藏”、“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合肥孔氏,指安徽合肥人孔宪廷,1915-1919年任甘肃兰山道尹,其间收集了大量敦煌写卷^⑪。此前,已有诸如“是何氏之物,后归于李氏凡将阁,藤井氏所藏,非径得于何,乃得自李氏者”^⑫、“据此目录所记与文书所捺印记可知,归于李氏之手前,在何氏与孔氏之手”^⑬的推测。那么此类推测是否合理呢?

此外,黑田彰先生从《太公家教》研究开始,近年来对有鄰馆及杏雨书屋的敦煌遗书的出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针对饶宗颐曾指出的“何氏原目中,尚有《太公家教》一,祭文一,孔子项託问答文一(有天福年号)”写本,黑田分析道:“存疑的太公家教等三件,本该归有鄰馆的何彦升旧藏文书的一部分,由于某种原因混入了敦煌秘笈之中。因此,我认为杏雨本太公家教的传入,和孔子项託相问书(羽617)、祭文(羽692)一起,均系出自何彦升旧藏文书。”^⑭

也就是说,本应成批的 65 或 66 件写本中的一部分“似流失旁处,未进入有鄰馆”^⑤,而现在归杏雨书屋的《太公家教》(羽 664)、《孔子项託相问书》(羽 617)、《祭文》(羽 692)等 3 件正是“似流失”的部分,这一发现具有非常重大的价值。但是,这成批的写本果真全系何家的旧藏吗?这一点尚应存疑。

其实,除上面提到的有鄰馆目录之外,尚有一部题为《敦煌石室唐人秘笈四十七种鉴藏者何秋鞏中丞孔繁锦道尹》的目录,数年前其影印件公开^⑥。目录用国立北平图书馆三号稿纸写成,含封面仅有薄薄 4 页(下称北平目录),仅从标题即可看出,它与有鄰馆目录有着密切关系。其内容进行了简单分类,列有疏札类共七种,牒状类共二十九种,文歌日历等九种,图书类两种,“总共四十七类四十四件”,此外记录了首尾不全、文字的大小及行草之别、有无纪年、料纸的种类及颜色等。在此,即使我们对两者的内容不做详细对比,也可看出约有半数与有鄰馆的所藏一致,应为同一写本^⑦。北平目录在题目之下注有此乃何秋鞏中丞即何彦升与孔繁锦道尹之旧藏的文字。孔繁锦(? - 1951)系民国时期军人,甘肃督军张广建的胞弟,因过继给舅父而改姓。张广建收藏敦煌写本之事非常有名,其弟孔繁锦应该也有一些藏品,但不会太多。另,孔繁锦系行伍出身,又未曾任道尹之位,恐怕是因为与孔宪廷同系安徽合肥人,而被人们搞混了。影印的封面写有“佚名撰,民国稿本”,此目录应该系商贾出售时所用目录。从其半数与有鄰馆目录一致或仅有半数一致的情况判断,这些写本的来源相同,北平目录所列的半数已被出售,所以运到日本的只能是后来对所剩半数逐渐进行增补,直至达到 65 种(66 种),而不可能是相反的情况。既然可以如此轻易对写本的数量弄虚作假,那么对何彦升旧藏进行重新审视也就十分必要了。何彦升在“窃取”发生的宣统 2 年(1910) 8 月已经卒没,其子何震彝也于 1916 年去世,考虑到罗振玉已在壬戌岁(1922)才得到何家的敦煌遗书数十卷,那么人们对后来出现的写本投以怀疑的目光,也就可以理解了。

黑田先生还有另外一个重大发现。黑田提到 1938 年 8 月 3 日《读卖新闻》刊登了一篇报道,内容是“魅惑之古书四十万卷/以受伤的勇士之手/回到日本的东洋珍宝/围绕北京‘李盛铎文库’的秘闻”,随报道一起还刊登了“长行马”文书的照片。将此照片与藤井有鄰馆所藏的同文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照片上未见现在钤有的“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之印。也就是说,可以判定这个印章

是在 1938 年 8 月《读卖新闻》报道之后至写本归有鄰馆之前的某个时间加盖上去的。这个发现让我们似乎可以亲眼目睹日藏敦煌遗书上常见的藏印被加盖上去的历史场景。从这个角度看,黑田的发现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⑧。

关于《读卖新闻》的这篇报道的详细情况各位可以参照报道原文^⑨,笔者在此只是简单提及,其大致经过如下。

步兵伍长(下士官)吉野信一郎在华中战场得病,养病期间收到北京一位朋友寄来的李盛铎旧藏书的目录《木犀轩藏书目录》,并附有李氏遗言,希望能够将其转移至日本,以图安泰。吉野听从了专家^⑩建议,知道这些资料内容极其珍贵,病愈之后刚刚服完兵役,就立即奉文部省之命前往北京,在现场对实物进行调查之后,发现确实是一大堆无比珍贵的历史文献。因为最终成交还需经过多次交涉,吉野就先带着十几张《敦煌石室唐人秘笈》六十五种的照片返回了日本。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这篇报道的关键是李盛铎的旧藏书,而不是敦煌写本。李氏旧藏的敦煌写本已于 1935 年经由李滂之手卖给了羽田亨,此时已不在李家。报道提及的李盛铎旧藏书籍最终并未运抵日本,而是于 1939 年底以 40 万元价格转让给了当时的北京大学^⑪。因此,从上述报道来看,我们无法确定吉野带回《敦煌石室唐人秘笈》六十五种的十数张照片与李氏旧藏书籍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当事人吉野是如何理解和看待两者之间关系的^⑫。

不管怎样,在此我们可以确定,相传为何彦升旧藏的 65 种(或 66 种)写本的大部分归为了有鄰馆,本来应该包含在内的 3 种写本最终到了羽田亨的手中。考虑到归羽田所有的 3 种是在昭和 14 年 11 月至昭和 17 年 4 月底期间自江藤长安庄处购入的这一情况,笔者认为有鄰馆的何彦升旧藏写本也是这一时期经由江藤之手出售给有鄰馆的,这种可能性最大。

五、作伪一例

羽田从江藤长安庄手中购买的写本与有鄰馆所藏写本之间,其实还存在着更为紧密的关系。这是因为现在收藏于杏雨书屋的羽 722(昭和 17 年 4 月购自江藤涛雄)和有鄰馆 36 号,是用同一佛典的背面伪造而成的。如图 3 所示^⑬,左右两篇文书都写有“昨日伏蒙/太保眷私……”字样,这是致太保书简的开始部分,两者几乎完全一样,而且两者都有“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之印,羽 722 更钤有“何彦升家藏唐人秘笈”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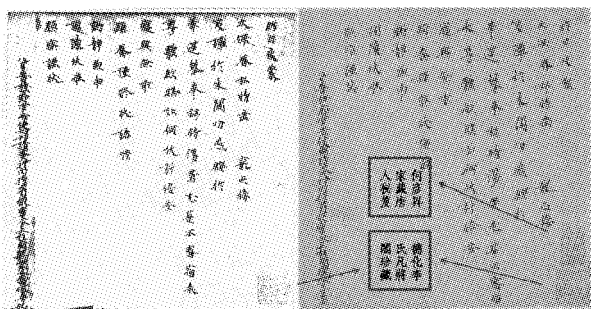


图3 书简(左为有鄰馆36,右为羽722)

此写本中存在几处奇怪之点。首先是纸张接缝处很不自然,左侧有鄰馆36号最后一行之前可见接缝,写信过程中在这个位置续接纸张极不自然。另一处就是,羽722在末尾一行的“八月五日旌节官告使朝请大夫行内侍省掖庭令上柱国赐紫金鱼”处戛然而止,再也没有下文了,这种现象也极不自然。而有鄰馆36号在此处下方书有“袋韦状”三字,毫无疑问这种做法是正常的。那么,造成羽722如此奇怪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推断,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书写者从上方开始写起,因为没有留足空间,最后无处可写,干脆省去了这三个字。

保持两个写本左右位置不变,一并将背面翻至朝上,如图4所示,可以发现其为内容连续的佛典,应为《妙法莲华经》卷第六的随喜功德品第十八的篇中开始至法师功德品第十九的前半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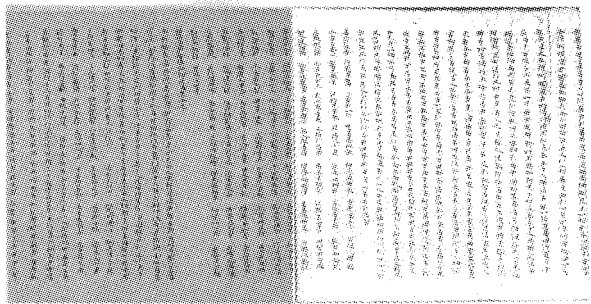


图4 背面(左为羽722,右为有鄰馆36)

也就是说,此两篇致太保的书简是使用了《妙法莲华经》的背面伪造的,故此才会出现奇怪的接纸现象。羽田在“新增目录”中将此处改作为“‘旌节官告使朝请大夫行内侍省掖庭令上柱国赐紫金鱼’书信稿,全十行^⑧背法华经法师功德品”。可能因为他感觉作为正式的书简太过奇怪,所以才改为“稿”。但只要放在一起稍作比较就会明白,两者既不是书稿也不是任何真实写本,只不过是杜撰而已。顺便提一下,北平目录中的记载为“伏蒙太保眷缘^⑨信稿一件十一行”,而有鄰馆目录中未见此书简的相关信息。此二书简恰好由于判明背面经典能够拼凑粘,毫无疑问证实了其系伪造。因此,不能否认也许还存在以此类方法

伪造其它写本的可能^⑩。

上述作伪案例具有某种标杆价值,因为能够如此清晰看透此类伪造手段的例子并不多见。当然这种手段的确十分拙劣,我们完全可以想像还存在更加高明的伪造方法。此类写本钤有“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章这件事本身就使我们警惕会有伪造的可能。藤枝教授“加盖(伪印)的做法表明,此类写经本身的真实性值得怀疑”^⑪的看法,原则上值得首肯,但并不应该以此作为判断真伪的标准。理想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不只看印章,而且还应考虑购买的背景及路径、文字的字体及书写风格、纸张的品质及尺寸,如果条件允许还应该援引化学分析法等,从多角度多路径加以考察。现在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应该在承认日藏敦煌遗书中存在不少伪作的基础上,对伪作展开综合性的全面调查。

六、刘廷琛的旧藏写本

一般认为,日藏敦煌遗书来自于1910年敦煌写本“劫馀”之后再遭窃取事件的核心人物李盛铎及何彦升、何震彝父子的旧藏写本。如上所述,何家写卷是在1922年归罗振玉之手的,因此经江藤长安庄之手出售给有鄰馆的写本,系“何彦升秋鞞中丞藏”的结论显然值得商榷,至少其中一部分确属贗作。而另一位当事人刘廷琛(幼云)的旧藏品又怎样呢?刘廷琛旧藏写本的绝大部分都在1932年刘氏本人去世之后,历经曲折,于战后1954年归北京图书馆,现在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⑫。但是,与李盛铎、何彦升、何震彝一样,刘氏旧藏写本也有过可能被卖到了日本。

较早之前,笔者曾托就职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朋友史睿氏复印了一份董康写给羽田亨的书信。后来这封书信得以公开发表^⑬,内容意味深长。虽有重复嫌疑,还是引用如下:

羽田先生赐鉴:

文旆东来,为谋东亚文化精神团结,昌谟宏议,时于尊俎间欣承教益,云萍契合,殆有夙由。因台端著作等身,性复嗜古,叠承垂询德化刘氏所藏敦煌经卷,具见关心文献,敦思古之崇情,兹特将详目开呈玄览。德化刘氏,即前清学部大臣刘廷琛,为海内有数藏书家,与李盛铎为至亲。经卷共八十余种,大率首尾完善,较诸李氏所藏为尤精。刘氏在时,曾有人议价五万元,终以未忍割让作罢。今刘氏业已物故,家复中落,倘贵国文化机关有意收藏,将与李氏藏经同有得主之幸。刘氏后人闻之,必欣然乐从。弟亦当极力玉成。原价俱在,较之李氏藏经为廉矣。如何之处,俾候酌夺

赐覆为感。

专泐，祇候公安

弟董康顿首八月卅日

从措辞推断，此应为羽田昭和13年(1938)前往中华民国及满洲国出差期间所收书简，内容系询问日本文化机构是否具有购买刘廷琛旧藏敦煌经计80余种的可能性。当年11月，羽田从图书馆长转任京都大学校长，他曾在数年前依靠武田长兵卫的资金援助一次性购买了李盛铎旧藏写本，所以董康向羽田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是大有原因的。随此书简附有刘氏经卷的详细目录，董康于两年前获得了这篇目录。

1936年晚夏，前来日本避暑的董康收到了黄公渚(1900-1964)发自青岛的信函，其中就有刘幼云(廷琛)旧藏的“敦煌卷子目”。董康从中挑选了20件佳品并在日记中作了记录^④，现在“刘幼云敦煌卷子目”已失传，其中所记80余种的内容已无从考据，但根据董康当年的这个记录，我们可以得知其中20余件的情况，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令人费解的是，正如尚林先生也曾注意到的那样，董康目录的20余件中“数卷”的经名、题记、纪年等与《学觚》第1卷第7期(1936年8月15日刊)所载《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中的部分藏品一致。对比两者，列出一致之处如下：

悲华经卷第四 高弼为亡妻元圣咸写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昆玉为姐写

金光明经卷第三 唐乾宁九载写经

金刚经一卷 唐天佑二年写

金刚经一卷 天仪封元年刘弘珪写

金刚经一卷 唐咸亨五年申待征写

经新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功德经卷下 唐景龙元年杜元礼写经

共7种^⑤。尚林就此作过解释，认为不能排除刘廷琛曾从李盛铎手中得到部分敦煌遗书的可能性^⑥。这一观点似过牵强。刘廷琛卒于1932年，李盛铎也于1934年初去世^⑦，如果此7种为刘廷琛从李盛铎手中所得，那么具体交割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只能推测应是两人生前。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董康接到黄公渚的“刘幼云敦煌卷子目”的时间为1936年9月11日，《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在《学觚》刊出是在不足一个月之前的同年8月15日，这时两人早已过世，怎么可能完成交割呢？一个是刘廷琛目录，一个是李盛铎目录，两人死后的1936年两个书目中出现了7种相同的经卷，这个问题，现在有必要做出新的研究和解释。

《学觚》的《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的前言如下：

德化李木斋氏于清季得斯坦因、伯希和两氏所未取之敦煌余珍甚多。去春曾以八万元日元，售诸异国，其目已载于中央时事周报之学觚栏。近闻李氏又有一批求售，虽数量较上次为少，且精美亦逊，但亦有重要者。特觅得其目，附载于此，以为国人之注意古籍者告。

李家的敦煌遗书，在李盛铎去世之后的1935年秋，买卖谈成，翌年2月之后写本陆续运抵京都，共432件。其目录刊登于1935年12月15日及21日出版的《中央时事周报》第4卷第48、49期的“学觚”栏^⑧，其实当时买方早已确定，而中央图书馆馆刊此时登出李氏敦煌目录的目的据说是在于“警惕国人，国宝流落海外，诚为国家之耻，勿步李氏后尘”^⑨，而不是寻求买主。但是《学觚》刊出的《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显然是“出售”的目录，前言中也强调了出售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推测这个目录实际上可能是刘廷琛的目录，从收藏件数为37件来看，尽管与“刘幼云敦煌卷子目”的80件差别很大，但现在如果我们能看到“刘幼云敦煌卷子目”的话，这里的37件应该都在其中。事实上，将刘氏的旧藏目录当作“德化李氏出售”，也可能仅仅只是一种误传，或是与“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相同，只是出于最大限度利用敦煌遗书收藏名人李盛铎的高知名度而已。

结语

本文以日藏敦煌遗书中的杏雨书屋以及藤井有邻馆的藏品为中心，分析了敦煌遗书传入日本以及作伪的部分情况。传入日本的敦煌遗书，几乎全部都是经古董商之手购买的，除李盛铎死后其子李滂直接转让的情况，路径非常可靠之外，其它往往都不可避免混有伪造之品。另外，包括“劫余”之后偷盗的主要人物李盛铎、何彦升和何震彝父子、刘廷琛等三家，包括最终没有运抵日本的部分在内，其余都与日本有着很深的瓜葛，这点特别意味深长。日藏敦煌遗书一方面与并不光彩的窃取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却被用于解开有关自身来路之谜的研究，这种状况的确具有讽刺意味。

注释：

①本文是在对2013年7月1日召开的中国中世写本研究班上发表的“日藏敦煌遗书辨疑”，以及同年12月10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召开的名为“敦煌遗书的现状与研究”演讲会上发表的“日藏敦煌遗书的来源和真伪问题”的内容进行了若干订正和添加之后形成的。

②劝之助恐为小川陆之助之误。京都大学医学部教授，著名收藏家。

③此外还附有收藏者不详的敦煌古写经，因与本文主题无关

在此不予列出。

④罗振玉自传《集蓼编》(1931年)中关于运到了李盛铎宅邸的记述恐怕不值得采信。

⑤《姚秦写本僧肇摩诃经残卷校记序》,收录于《贞松老人遗稿甲集》(辛巳年(1941),北京刊)的《后丁戊稿》中。但执笔是丁丑(1937)中秋。

⑥罗振玉在这些写本上都钤有“抱残翁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印,有此印章的写本现在散落在南京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等各处。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刘子》残卷亦为壬戌岁所得,从其跋文中记有“壬戌(1922)秋得此于江阴何氏,索居无俚,校其异同于明人《子汇》本上,并以别纸遗儿子福葆录为校记一卷,以授梓人。癸亥(1923)二月,上虞罗振玉记。”可知,其亦来自何家。

⑦拙文“李滂与白坚——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流入日本的背景”《敦煌写本研究年报》创刊号(2007年3月),1-26页。中文版见于《西域文史》第9辑(2014),333-367页。

⑧关于这个目录请参照落合俊典“羽田亨著《敦煌秘笈目录》简介”(《敦煌文献论集》91-10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⑨数字为购入价格。下同。

⑩在接收清野谦次所藏写本时,清野所作目录也被一并编入。

⑪近年陆续影印公开的《敦煌秘笈》影片册中775号之前都有登记,其中737以后为武田家独自购入。另,如扣除缺失的15件,现在杏雨书屋所藏之“敦煌秘笈”的情况便如上所述,共760件。

⑫藤枝晃“关于‘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京都国立博物馆学丛》第7号(1986年1月),153-173页。

⑬432件写本所见印章中“李盛铎和家眷属供养”印和“两晋六朝三唐五代妙墨之轩”印,在一般传为李盛铎旧藏写本之中从未有过。同为卖主的“李滂”之印,也同样十分鲜见。最近,岩本笃志氏从钤印的分布与“李滂”之印一致的情况判断,“敦煌石室秘籍”印也系李滂的印章。这一见解应是正确的。岩本笃志“敦煌文献藏书记研究——以日本所藏藏品为中心”,2014年9月,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展望未来20年的敦煌写本学”(Prospects for the Study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The Next 20 Years)上的宣读论文(未发表)。

⑭关于此印,藤枝在上述论文中没有提及。守屋收藏中的《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十二中可见。此有可能亦为伪印。

⑮藤枝晃“‘长行马’文书”,《东洋史研究》第10卷第3号,213-217页。

⑯最初公开发表于徐亮之编《金匱论古综合集》第一期(1955年,香港统营公司发行),后收录于《选堂集林·史林》下卷(中华书局香港分局)998-1010页。

⑰《墨美》60号(1956年11月),正文2-13页,图版·释文14-34页。

⑱近年,为数不少的有邻馆收藏写本流入市场,其中一卷《唐人杂抄》到了池田温氏手中,池田将其捐赠给了东洋文库,同时亲自撰写了“关于《唐人杂抄》”一文,发表于《东洋文库书报》第41号(2010),文中不仅对本卷而且对藤井有邻馆及其所藏均有详细的记述。

⑲据藤枝《长行马》记载,目录的标题为《何彦升秋鞞中丞藏敦煌石室唐人秘笈六十五种》,稍后引用《读卖新闻》的相关报道中也称六十五种。因此,六十六种之说可能是饶宗颐的记忆有误,六十五种应该是正确的。

⑳饶宗颐在1954年曾目睹了这个目录,现在我们看不到目录,只有题为“新疆布政使何彦升旧藏敦煌石室唐人秘笈目录”的一个夹板,据信目录应该收在夹板之中。另,夹板的标题旁边有“五十九种”“歌曲册”的小字注释。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96页。

㉑陈红,林世田“敦煌遗书近现代鉴藏印章辑述(上)”,《文献》2007年第2期,41页。

㉒饶宗颐“京都藤井氏有邻馆藏敦煌残卷纪略”,《选堂集林·史林》下卷,1001页。

㉓藤枝《长行马》,2页。

㉔黑田彰“关于杏雨书屋本太公家教——太公家教·补(二)”,《杏雨》第14号(2011),270-271页。

㉕藤枝《长行马》,2页。

㉖《敦煌书目题跋辑刊》(2010年,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第3册,2495-2502页。

㉗前文所提黑田氏提到的杏雨书屋现藏的3件之中,关于祭文(羽692)有记载“祭文一件八行”,两者一致,但太公家教和孔子项託相问书在北平目录中未见。

㉘北平目录完全没有提及印记之事,标题下列出鉴藏者何氏或孔氏的名字,其根据无非就是写本上钤有“何彦升家藏唐人秘笈”、“合肥孔氏珍藏”之印罢了,而李氏没有被作为原收藏者列出,盖因为“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还没有加盖于写本之上。

㉙黑田彰论文282页以后所引。

㉚指吉野的高中同学,时任文部省国宝鉴查官补的田山信郎(方南)。

㉛参照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增订本)》(2009年,北京:中华书局),28页。其全貌可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三册(1956年,北京大学图书馆)。

㉜吉野信一郎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从事证券工作。他在北京如何开展调查非常值得关注。《敦煌石室唐人秘笈》六十五种(!)只可能就是归有邻馆所有的何彦升旧藏写本。报道也提到了李滂的名字,但从上下文看其意只在强调兄弟之中只有他才为保存藏书操心。吉野从未说起见过李滂,给人的印象是他并未直接接触过李家成员。

㉝两张图版一为彩色一为黑白,不方便对照,在此表示深深歉意。有邻馆36号在日本书艺院编辑发行的《有邻馆名品展图册》(1992年)第45页上登载了清晰的彩色照片,但是为方便与背面佛典对比在此仍然采用了黑白照片。

㉞十一行之误,或未将最后一行计算在内。

㉟系私字之误读。羽722中也错书为“移”字。

㊱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附属欧亚文化研究中心(羽田纪念馆)的“羽田亨博士收集西域出土文献写真”的445中,除有邻馆36之外,还有两篇类似书信的照片,它们都由10行构成,文言虽与36号不完全一致,但相差无几。因无背面照片,虽然无法证明是否也是利用法华经背面社撰的伪作,但恐怕也属同类之作。此两个片段之上都加盖了何氏与孔氏的印章。也可参照张娜丽“关于羽田亨博士收集‘西域出土文献写真’”《御茶之水史学》第50号(2006),35页以后内容。

㊲藤枝晃“关于‘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156页。

㊳尚林“刘廷琛旧藏敦煌遗书流失考”《汉学研究》第12卷第2期(1994年12月),352-353页。

㊴林世田,萨仁高娃“国家图书馆刘廷琛旧藏敦煌遗书叙录与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2008),489-498页。

㊵董康《书舶庸谭》卷九,1936年9月11日条。董康摘录的这个目录可见于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散录”7。

㊶董康目录中注明了写本的长度及纸高,此处省略。

㊷尚林“刘廷琛旧藏敦煌遗书流失考”《汉学研究》第12卷第2期(1994年12月),348-349页。

㊸关于李盛铎的卒年问题,曾有1934、1935、1937等诸多说法,现已查明系1934年初去世。王茜“藏书家李盛铎卒年辨正”《文献》2010年10月第4期,191页。

㊹民国时期,南京中央图书馆发行的馆刊《学瓠》,最初是《中央时事周刊》的一个专栏。其发展过程,袁明嵘在“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学瓠》学瓠栏探源”一文中有详细考证。《国家图书馆馆刊》一百年第二期(2011.12),160-180页。

㊺袁明嵘上引文,168页。

收稿日期 2016-09-10 责任编辑 申燕